

职住分离、父母陪伴与青少年人力资本发展

李汉雄 孙伟增 杨思媛*

内容提要 文章采用2014-2018年三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了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父母平均通勤时间每增加15分钟,子女的数学和语文成绩会分别显著下降0.6~2.4分和0.4~1.6分,其中母亲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二,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个体、家庭和地区异质性,女孩、中学生、父母从事自雇工作或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以及居住在乡镇、郊县和西部地区的青少年,其学习成绩受职住分离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参加课外辅导和隔代照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住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通勤时间增加减少了父母对子女在校情况的关注以及对作业完成的要求,是导致子女学习成绩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鼓励生育和“双减”政策背景下,文章的研究发现对于合理设计差异化的城乡发展布局规划,提高社会生育意愿和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关键词 职住分离 通勤时间 父母陪伴 学习成绩

一 引言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中国城市中的职住分离现象不断加剧(柴彦威等,2011;梁海艳等,2014;任媛等,2018)。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2020年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有超过

* 李汉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lihanxiong029@163.com;孙伟增(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sunweizeng@gmail.com;杨思媛,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ysysky0509@163.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9032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1000 万就业人口的单程通勤时间达到 1 小时以上，占到这些城市总就业人数的 13%，其中北京、上海和重庆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都超过 40 分钟。长时间的通勤不仅会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工作状态，导致其工作效率下降（Ross & Zenou, 2008；van Ommeren & Gutiérrez-i-Puigarnau, 2011；符婷婷等, 2018；孙斌栋等, 2019；Lu et al., 2022），也给就业者在工作 and 家庭之间的时间分配提出了新的挑战。不难推断，在工作时间缺乏弹性的情况下，通勤时间增加会挤出就业者用于休闲与家庭照料的时间（Black et al., 2014；苗瑞凯、王俊秀, 2021；李春江等, 2021），影响居民家庭的生活质量。例如，有研究发现长时间通勤使得夫妻的分居率明显提高（Sandow et al., 2014）。

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就业者本身不同，本文聚焦于对家庭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儿童人力资本发展问题，考察日趋严重的职住分离现象对就业者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其核心逻辑在于通勤时间的增加会改变父母照顾和陪伴子女的时间投入。特别是在“双减”政策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家庭教育和父母陪伴对于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尤为重要（Ruhm, 2004；胡枫、李善同, 2009；李云森, 2013；董志强、赵俊, 2019；王春超、林俊杰, 2021）。

从理论上讲，职住分离对于个体工作 - 家庭时间分配的影响可能通过“稀缺假说”和“加强假说”产生正反两方面作用（Sieber, 1974；Ruderman et al., 2002；Aryee et al., 2005）。其中，“稀缺假说”（scarcity hypothesis）认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通勤时间增加会导致个体在工作上的角色压力上升，从而减少对家庭和子女的照料陪伴；与之相反，“加强假说”（expansion-enhancement hypothesis）认为，当与工作相关的时间投入增加时，就业者可能会有意识地加强自身在家庭照顾上的注意力和责任感，表现为个体会将更多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照料上。因此，我们无法通过理论分析得出通勤时间增加对个体工作 - 家庭时间分配的一致结论，至于总体影响效应如何，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三期数据，实证考察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我们通过挑选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不变的样本排除了潜在的通勤时间增加的内生性原因，验证了通勤时间的外生变化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因果效应。本文主要研究发现包括：第一，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来看，父母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数学和语文成绩分别下降 0.6 ~ 2.4 分和 0.4 ~ 1.6 分；第二，通勤时间增加显著降低了女性、处于中学阶段、父母从事自雇工作以及居住在乡镇、郊县和西部地区的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而对参加课外辅导、父母

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家庭中有祖辈老人的子女负向影响较小；第三，机制分析表明，通勤时间增加导致就业者陪伴子女的频率显著减少，进而影响了子女学习成绩，即验证了“稀缺假说”。

本文的创新点和可能的贡献主要有：第一，本文从城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角，首次关注了城市空间职住分离现象对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具有代表性的 CFPS 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了父母陪伴的微观机制；第二，从性别、受教育阶段、父母职业、家庭结构等多个维度讨论了通勤时间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异质性，对于政策制定者合理设计差异化的城乡发展布局规划，提高社会生育意愿和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和实证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影响机制分析；最后是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 文献述评

（一）职住分离与工作－家庭平衡

职住分离是指就业者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存在的空间分离现象（Duncan, 1956），同时也是影响就业者工作与家庭时间分配的重要因素（White, 1986）。结合经典的工作－家庭平衡理论（Sieber, 1974；Aryee et al., 2005），职住分离对就业者工作－家庭时间分配的影响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作用效果。

首先，工作－家庭平衡理论中的“稀缺假说”认为，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压力是不相容的（Greenhaus & Beutell, 1985）。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当个体投入到某一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增加时，在另一方面的投入将会减少（王晶等，2010），并且由此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在长期会对个体心理和生理造成负面影响（Amstad et al., 2011）。例如吴重涵等（2017）发现，父母刚性的工作时间使他们无暇参与到子女教育中。因此基于“稀缺假说”可以推测，通勤时间增加可能会挤出个体在家庭照料和子女陪伴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职住分离程度提升可能导致就业者工作时间增加，从而进一步减少照料家庭和陪伴子女的时间。例如，Gutiérrez-i-Puigarnau & van Ommeren（2010, 2015）分析了通勤距离对德国和英国家庭工作－家庭时间分配的影响，发现通勤距离增加会导致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增加，而已婚男性的劳动供给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更为深入的研究中，Sakanishi（2020）认为通勤时间增加提高了就业

者的工作成本，由于维持家庭开支和养育子女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因此当居住分离程度提高时，就业者会增加劳动供给以获取更高的工资补偿。考虑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中，母亲更多地承担着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责任（丁守海、时新哲，2012；熊瑞祥、李辉文，2016；詹鹏等，2021），因此母亲通勤时间的增加可能导致家庭中投入到子女照料的时间和精力更大幅度地减少。

然而，工作-家庭平衡理论中的“加强假说”认为，工作和家庭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Ruderman et al., 2002）。Grzywacz et al.(2007)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个体在工作中的投入增加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和自我成就感，这种正向作用也会对其家庭照顾方面产生增益效果。李贵卿等（2010）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了企业管理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多角色责任感的相互影响，发现工作责任感提升对家庭责任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学者总结了关于工作-家庭平衡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个体在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上不只有相互冲突的消极影响，也存在着互惠互利和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王晶等，2010）。由此来看，当通勤时间增加时，个体也可能会增加投入在家庭照顾上的时间和精力。

（二）父母陪伴与子女发展

居住分离可能影响就业者在家庭照料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而父母陪伴对子女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例如，Ruhm（2004）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幼年时期父母陪伴的缺失对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梁文艳等（2018）通过对 2013-2014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父母对子女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增加能够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李云森（2013）基于 2000 年甘肃儿童和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发现，父母中一方或双方陪伴缺失半年以上会显著降低孩子的数学和语文成绩。董志强和赵俊（2019）通过自然实验发现，父母陪伴缺失在短期可能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而在长期可能进一步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表现。王春超和林俊杰（2021）利用 CEPS 和 CFPS 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亲子陪伴时间对初中教育阶段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经济投入，父母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对子女的学业发展更为重要（李佳丽、何瑞珠，2019；顾天竹等，2021）。

将父母陪伴方式进一步分类，Gonzalez-DeHass et al.(2005)、Avvisati et al.(2014) 以及张皓辰和秦雪征（2019）认为，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关注程度增加能够提高子女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孩子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Hango（2007）分析了英国 1958 年出生人群的受教育情况与其父母陪伴经历的关系，认为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能够

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受教育水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而周皓（2013）与 Blondal & Adalbjarnardottir（2014）发现相较其他类型的父母陪伴，更多的亲子间交流，尤其是亲子间经常讨论孩子学校发生的事情，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长期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徐鑫镔等（2020）基于上海 1569 名高中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父母积极参与子女学业并减少对子女的心理控制更有利于提高亲子间关系和降低子女的消极情绪。

父母陪伴中的角色差异也会对子女的学习成长产生异质性影响。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母亲陪伴的缺失对子女的认知水平、学习成绩与受教育水平都会产生不利影响（Ermisch & Francesconi, 2013；李庆海等，2014；Del Bono et al., 2016；许琪，2018；秦敏、朱晓，2019），父亲陪伴则对孩子的非认知能力更为重要（吴愈晓等，2018）。也有学者认为，母亲陪伴缺失更多地会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等主观方面，而父亲陪伴缺失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唐有财、符平，2011）。

综合上述已有研究可以得出，职住分离对就业者工作 - 家庭时间分配的两种影响模式可能同时存在，并对陪伴子女的时间投入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考虑到中国与欧美国家客观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在中国城市中究竟哪种模式占主导，有赖于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为全面深入理解职住分离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提供可靠的证据。

三 数据和实证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调查采集，其中包含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采用 CFPS 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CFPS 调查数据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样本规模大，覆盖范围广，调查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且数据质量受到学术界广泛肯定；第二，调查对象涵盖了目标样本中所有的家庭成员，既收集了各个年龄段青少年成长过程、学习过程的各方面信息，又包含其父母和家庭的翔实情况，通过微观数据匹配有利于探讨父母和家庭因素对子女成绩的影响；第三，CFPS 数据具有动态连续性，连续多期的面板数据为控制各类固定效应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排除不变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

具体地,本文借鉴孟斌(2009)的方法,采用父母双方平均的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作为职住分离的度量指标。采用 5~16 岁未成年人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以及两科的平均成绩作为子女成绩的代理变量。父母陪伴则主要选取调查问卷中涉及到的可能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 4 个指标,包括父母与子女讨论学校事情的频率(很经常=1,从不=5),督促子女完成作业的频率(很经常=1,从不=5),检查子女作业的频率(很经常=1,从不=5),以及访员根据家庭环境观察到的父母关心子女教育的程度(很同意=1,很不同意=5)。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子女学习成绩,剔除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上学的少儿样本;第二,为检验父母陪伴是否是职住分离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一种潜在机制,在实证分析中仅保留了父母和子女均主要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样本;第三,基于个人编码和家庭编码将少儿信息与其父母和家庭信息进行匹配,最终合成为 3 个调查年度共计 1763 个样本。

表 1 报告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就业者子女的个体特征中,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均值为 2.05 和 2.10,语数平均成绩大约达到良(=2)的水平;性别上,男孩占比 51%,稍高于女孩比例;受教育阶段平均值为 3.20,即小学生居多;人均的教育总开支为 2900 元,其中课外辅导费为 1300 元;每天从住处到学校花费的平均时间大约为 13.2 分钟。家庭特征中,父母平均的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为 15 分钟,最多的为 2 小时 15 分钟;平均家庭规模约 5 人,户均子女 1.9 人;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占比为 60%;36%的家庭拥有私家车。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特征:						
<i>math</i>	数学成绩(优=1,差=4)	1763	2.05	1.00	1	4
<i>chinese</i>	语文成绩(优=1,差=4)	1763	2.10	0.95	1	4
<i>mcores</i>	语数平均成绩(优=1,差=4)	1763	2.08	0.89	1	4
<i>age</i>	年龄(岁)	1763	10.55	2.27	5	16
<i>gender</i>	性别(女=0,男=1)	1763	0.51	0.50	0	1
<i>hukou</i>	户口(农业=0,非农=1)	1763	0.66	0.47	0	1
<i>school</i>	受教育阶段(小学=3,高中=5)	1763	3.20	0.41	3	5
<i>exp_tutor</i>	课外辅导费(万元)	1763	0.13	0.47	0	10
<i>exp_edu</i>	教育总开支(万元)	1763	0.29	0.63	0	11.9
<i>schtme</i>	住处到学校时间(小时)	1763	0.22	0.16	0.02	2

续表

变量名	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特征：						
<i>ctime</i>	父母平均通勤时间(小时)	1763	0.25	0.28	0	2.25
<i>family_n</i>	家庭成员数(人)	1763	4.99	1.65	3	13
<i>child_n</i>	子女数量(人)	1763	1.90	0.88	1	7
<i>urban</i>	城乡分类(乡村=0, 城镇=1)	1763	0.60	0.49	0	1
<i>edud</i>	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文盲=1, 硕士=7)	1763	2.99	1.09	1	6.5
<i>savings</i>	现金和储蓄总额(万元)	1763	6.15	15.39	0	300
<i>car</i>	是否有私家车(有=1, 无=0)	1763	0.36	0.48	0	1
城市特征：						
<i>pop</i>	总人口(万人)	1763	576.45	369.39	42.98	3404
<i>gdp</i>	GDP(亿元)	1763	4478.32	7056.94	128.4	32679.87
<i>gdp2</i>	第二产业产出占比(%)	1763	43.13	10.26	9.20	75.53
<i>gdp3</i>	第三产业产出占比(%)	1763	45.20	10.55	19.76	80.98
<i>fin_inc</i>	财政收入(亿元)	1763	629.36	1485.30	7.65	7108.15
<i>fin_pay</i>	财政支出(亿元)	1763	852.42	1612.72	56.88	8351.54
父母陪伴：						
<i>talksch</i>	与子女讨论学校事情(很经常=1, 从不=5)	1694	2.57	1.06	1	5
<i>finish_hw</i>	督促子女完成作业(很经常=1, 从不=5)	1514	1.91	0.96	1	5
<i>check_hw</i>	检查子女作业(很经常=1, 从不=5)	1498	2.42	1.24	1	5
<i>care_edu</i>	父母关心子女教育(很同意=1, 很不同意=5)	1569	2.23	0.81	1	5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实证设计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是考察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第二部分进一步检验父母陪伴是否是职住分离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一种可能机制。先来分析通勤时间与子女学习成绩。我们基于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父母通勤时间对其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方程如下：

$$score_{it} = \alpha_0 + \alpha_1 ctime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_i + \varphi_t + \mu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score_{it}$ 表示子女 i 在年份 t 的学习成绩，包括数学成绩 (*math*)、语文成绩 (*chinese*) 和语数两科平均成绩 (*mscores*)；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双方平均的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 $ctime$ ；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子女学习成绩的潜在影

响，控制变量 X 包含了子女的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所在城市特征变量； λ_i 为子女的个体固定效应， φ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_{it} 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残差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在个体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模型（1）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α_1 反映了父母通勤时间（职住分离程度）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当 α_1 大于零时表示父母通勤时间的增加会降低子女学习成绩，反之则表示会提高子女学习成绩。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分析，本文认为父母陪伴可能是职住分离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一种潜在机制。因此，利用 CFPS 调查问卷中 4 个关于父母陪伴的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我们采用两步法检验父母陪伴在职住分离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中发挥的机制作用，具体模型如下：

$$accompany_{it} = \beta_0 + \beta_1 ctime_{it} + \beta_2 X_{it} + \lambda_i + \varphi_t + \mu_{it} \quad (2)$$

$$score_{it} = \gamma_0 + \gamma_1 accompany_{it} + \gamma_2 X_{it} + \lambda_i + \varphi_t + \mu_{it} \quad (3)$$

模型（2）首先考察通勤时间对父母陪伴子女频率的影响，其中 $accompany$ 是表示父母陪伴的代理变量，包括父母与子女讨论学校事情的频率（ $talksch$ ），督促子女完成作业的频率（ $finish_hw$ ），检查子女作业的频率（ $check_hw$ ），以及访员根据家庭环境观察到的父母关心子女教育的程度（ $care_edu$ ）。这里主要关注系数 β_1 ，如果为正，说明通勤时间的增加会降低父母陪伴子女的频率，反之则表示会提高父母陪伴子女的频率。模型（3）进一步考察父母陪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系数 γ_1 反映父母陪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预期为正，即父母陪伴有助于子女学习成绩的提升。综合模型（2）和模型（3）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当 β_1 和 γ_1 均为正时，证明职住分离程度提高会导致父母陪伴子女的频率下降，进而降低子女的学习成绩，即验证了父母陪伴在职住分离影响子女学习成绩中的机制作用。

四 实证结果：通勤时间与子女学习成绩

（一）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之后， $ctime$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父母通勤时间的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具有负向影响。根据偶数列的回归结果，父母双方平均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的数学成绩平均下降

0.071 个单位 (= 0.284/4)，按百分制计算约为 0.6 ~ 2.4 分^①；语文成绩大约下降 0.048 个单位，相当于 0.4 ~ 1.6 分；两科平均成绩下降 0.059 个单位，相当于 0.5 ~ 2.0 分。表 2 中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职住分离对子女学习成绩的显著负向影响，且对于数学成绩的影响要大于语文成绩，这与李庆海等（2014）针对父母外出务工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数学学习更加注重日常的习题和逻辑思维练习，而语文学习侧重于对生活与情感的表达；职住分离使得父母疏于对子女习题作业的考察监督，因此导致对子女语数成绩的影响存在差异。关于父母职住分离对子女学习监督的可能影响，随后的机制分析中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讨论分析。

表 2 父母通勤时间与子女成绩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1)	(2)	(3)	(4)	(5)	(6)
<i>ctime</i>	0.286 *** (0.102)	0.284 *** (0.102)	0.185 * (0.097)	0.190 * (0.098)	0.235 *** (0.084)	0.237 *** (0.0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63	1763	1763	1763	1763	1763
R ²	0.745	0.751	0.724	0.731	0.763	0.769

注：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考虑到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差异，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考察了父母各自的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根据表 3 中的回归结果，不论对子女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还是语数平均成绩，母亲通勤时间 (*ctime_m*) 的回归系数值均大于父亲通勤时间 (*ctime_f*) 的回归系数值，说明相较于父亲，母亲通勤时间的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更大。基于家庭分工理论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母亲更多承担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而父亲一般从事在外经济劳动（丁守海、时新哲，2012；

① 按满分 100 分计算，85 ~ 100 为优秀 (1)，75 ~ 84 为良好 (2)，60 ~ 74 为中等 (3)，60 以下为差 (4)。从“优秀”到“差”变化为 3 个单位，百分制的分差在 26 (= 85 - 59) 和 100 (= 100 - 0) 之间。因此，1 个单位的变化对应的分值约为 8.7 ~ 33.3 分。

熊瑞祥、李辉文, 2016; 詹鹏等, 2021), 因此母亲职住分离程度的提升会导致子女学习成绩更大幅度的下降。这也与上述文献回顾中母亲陪伴缺失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更为严重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唐有财、符平, 2011)

表 3 父母各自通勤时间与子女成绩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1)	(2)	(3)	(4)	(5)	(6)
<i>ctime_f</i>	0.135 ** (0.057)	0.145 ** (0.057)	0.091 (0.066)	0.102 (0.068)	0.113 ** (0.054)	0.123 ** (0.055)
<i>ctime_m</i>	0.232 ** (0.110)	0.203 * (0.115)	0.144 (0.110)	0.124 (0.110)	0.188 ** (0.093)	0.163 * (0.0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42	1642	1642	1642	1642	1642
R ²	0.756	0.762	0.726	0.734	0.768	0.774

注: 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中可能面临如下两点内生性问题: 第一, 反向因果。父母为了不影晌子女的学习成绩, 可能会通过变更居住地、交通方式甚至工作来减少花费在通勤上的时间。第二, 遗漏变量。虽然模型中已经控制了个体、家庭和城市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 以及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父母通勤时间和子女学习成绩同时产生影响。

有效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寻找工具变量。但是, 由于无法得知家庭住址以及父母工作单位地址信息, 很难找到仅影响父母通勤时间的外生工具变量。为此, 本文尝试从影响家庭通勤时间变化的因素入手, 来寻找相对外生的冲击。具体来说, 通勤时间发生变化通常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 工作地发生变化, 包括更换工作单位 (情况①) 和单位地址变化 (情况②) 两种; 第二, 居住地发生变化, 主要指搬家 (情况③); 第三, 交通方式或条件发生变化, 包括家庭主动的变化, 例如买车 (情况④), 和相对被动的变化, 例如新修路或新建地铁 (情况⑤)。显然, 情况①、③和④都是家庭主观选择的结果, 很难满足外生性要求, 它们的存在是影响本文估计结果准

确性的主要原因。为了排除这些情况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模型中控制了家庭是否有车这一变量，来排除情况④；第二，剔除家庭住址或者父母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的样本，来排除情况①和③的影响。基于上述处理，剩下的通勤时间变化将主要来自相对外生的情况②和情况⑤。考虑到情况⑤也可能通过影响子女上下学的时间进而影响其学习成绩，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上下学的时间。

表4 父母通勤时间与子女成绩（稳健性检验）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1)	(2)	(3)	(4)	(5)	(6)
Panel A: 居住地和父母工作不变						
<i>ctime</i>	0.221 ** (0.103)	0.245 ** (0.114)	0.094 (0.088)	0.061 (0.097)	0.158 ** (0.077)	0.134 * (0.081)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75	526	575	526	575	526
R ²	0.043	0.108	0.037	0.084	0.036	0.085
Panel B: 排序离散选择模型						
<i>ctime</i>	0.254 ** (0.118)	0.224 ** (0.111)	0.130 (0.094)	0.089 (0.092)	0.237 ** (0.101)	0.182 * (0.09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38	1734	1838	1734	1838	1734

注：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4中的Panel A汇报了经过上述样本处理之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前两列中 *ctime*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排除了可能的内生原因后，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数学成绩仍然具有负向影响。在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之后，父母双方平均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的数学成绩平均下降 0.061 个单位，大约相当于 0.5 ~ 2.0 分。第 3 列和第 4 列的回归结果进一

步证实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语文成绩的负向影响较小。从语数两科平均成绩来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父母双方平均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语数两科平均成绩下降 0.034 个单位，相当于 0.3 ~ 1.1 分。

本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子女学习成绩采用的是离散变量设定，因此也可以采用排序离散选择模型进行估计。表 4 中 Panel B 是采用排序离散选择模型考察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回归结果。控制各项特征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父母双方平均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的数学成绩显著下降 0.056 个单位，相当于 0.5 ~ 1.9 分；语文成绩下降 0.022 个单位（但不显著）；语数两科平均成绩显著下降了 0.046 个单位，相当于 0.4 ~ 1.5 分。调整估计方法后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具有负向影响。表 5 进一步分析了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边际效应。

表 5 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成绩影响的边际效应（排序离散选择模型）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1)	(2)	(3)	(4)	(5)	(6)
1 = 优	-0.058 ** (0.027)	-0.051 ** (0.025)	-0.030 (0.021)	-0.021 (0.021)	-0.046 ** (0.019)	-0.036 * (0.019)
2 = 良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3 = 中	0.029 ** (0.013)	0.026 ** (0.013)	0.018 (0.013)	0.013 (0.013)	0.023 ** (0.010)	0.018 * (0.010)
4 = 差	0.027 ** (0.013)	0.024 ** (0.012)	0.012 (0.009)	0.008 (0.009)	0.014 ** (0.006)	0.010 * (0.006)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38	1734	1838	1734	1838	1734

注：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 5 第 2 列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数学成绩获“优”的概率显著下降 1.3 个百分点，导致数学成绩获“差”的概率显著增加 0.6 个百分点。第 3 ~ 4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语文成绩的负向边际效应不显著。

（三）异质性分析

由于个体、家庭和地区差异客观存在，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可能呈现出异质性结果。本文从个体层面上子女的性别、受教育阶段、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家庭层面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是否有祖辈老人（能够隔代照顾），和地区层面上居住地的城乡类型、是否在市辖区以及所属东中西部地区划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在个体层面上，Panel A 分析了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的性别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父母平均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女孩的数学成绩显著下降 0.090 个单位（第 1 列）；男孩的数学成绩平均下降 0.060 个单位（第 4 列），但不显著。同样地，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女孩语文成绩和语数两科平均成绩的负向影响也均大于对男孩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按照子女受教育阶段的不同，Panel B 汇报了小学和中学阶段子女学习成绩受父母通勤时间影响的群体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小学阶段，父母通勤时间增加使得中学阶段子女学习成绩更大幅度地下降。而从是否参加课外辅导的角度进行异质性讨论，Panel C 中的回归结果发现，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未参加课外辅导子女的学习成绩造成了更大且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导致以上异质性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相较于男孩，女孩对生活环境的反应可能更为敏感，因此当父母由于通勤时间增加而对子女的陪伴减少时，女孩的学习成绩受影响更大；第二，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其主观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中学阶段的青少年在缺少与父母交流沟通时更容易产生厌学心理（聂金菊，2005）；第三，参与课外辅导相当于延长了在校学习时间，弥补了父母陪伴缺失对子女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

在家庭层面上，Panel D 根据家庭教育背景差异将父母受教育水平分为初中及以上和初中以下。实证结果发现，在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初中及以上的家庭中，父母平均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子女的数学成绩显著下降 0.070 个单位，语文成绩下降 0.046 个单位（不显著），两科平均成绩显著下降 0.058 个单位；而在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的家庭中，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效应较小且不显著。此外，从父母工作类型和家庭是否有祖辈老人的差异来看，Panel E 和 Panel F 的回归结果表明，当父母至少有一方从事自雇工作，以及家庭中没有祖辈老人时，父母通勤时间的增加会导致子女学习成绩更大幅度地下降。本文认为，高学历家长对子女学习的辅导作用可能更为明显；父母从事自雇工作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家庭中祖辈老人能够进行隔代照料，缓解一部分父母对子女的陪伴缺失（许琪，2018）。

表 6 父母通勤时间与子女成绩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Panel A: 性别	女孩			男孩		
<i>ctime</i>	0.360 ** (0.145)	0.251 * (0.135)	0.305 ** (0.123)	0.238 (0.155)	0.171 (0.139)	0.205 * (0.120)
样本量	857	857	857	884	884	884
R ²	0.740	0.739	0.766	0.773	0.723	0.778
Panel B: 教育阶段	小学			中学		
<i>ctime</i>	0.368 *** (0.127)	0.190 (0.118)	0.279 *** (0.107)	0.620 * (0.363)	0.172 (0.343)	0.396 * (0.238)
样本量	1265	1265	1265	160	160	160
R ²	0.749	0.740	0.769	0.879	0.869	0.891
Panel C: 课外辅导	不参加			参加		
<i>ctime</i>	0.335 ** (0.134)	0.262 ** (0.118)	0.298 *** (0.098)	-0.028 (0.203)	0.141 (0.215)	0.056 (0.170)
样本量	1097	1097	1097	306	306	306
R ²	0.754	0.729	0.769	0.805	0.768	0.814
Panel D: 父母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上			初中以下		
<i>ctime</i>	0.280 ** (0.133)	0.182 (0.126)	0.231 ** (0.114)	0.194 (0.170)	0.161 (0.158)	0.177 (0.133)
样本量	983	983	983	719	719	719
R ²	0.769	0.749	0.787	0.727	0.686	0.729
Panel E: 父母工作类型	至少一方自雇			均受雇		
<i>ctime</i>	0.467 *** (0.142)	0.259 * (0.139)	0.363 *** (0.119)	0.025 (0.177)	0.017 (0.151)	0.021 (0.135)
样本量	803	803	803	682	682	682
R ²	0.731	0.732	0.751	0.796	0.764	0.810
Panel F: 祖辈老人	无			有		
<i>ctime</i>	0.274 ** (0.124)	0.270 ** (0.104)	0.272 *** (0.103)	0.248 (0.296)	-0.118 (0.281)	0.065 (0.246)
样本量	1188	1188	1188	316	316	316
R ²	0.764	0.754	0.789	0.768	0.773	0.784
Panel G: 城乡类型	乡镇			城市		
<i>ctime</i>	0.350 ** (0.176)	0.145 (0.165)	0.248 * (0.144)	0.237 * (0.126)	0.228 * (0.124)	0.232 ** (0.104)

续表

	(1)	(2)	(3)	(4)	(5)	(6)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样本量	673	673	673	1040	1040	1040
R ²	0.739	0.736	0.759	0.769	0.733	0.782
Panel H: 是否在市辖区	否			是		
<i>ctime</i>	0.402 *** (0.148)	0.104 (0.132)	0.253 ** (0.112)	0.226 * (0.136)	0.265 * (0.148)	0.246 ** (0.124)
样本量	947	947	947	814	814	814
R ²	0.749	0.732	0.766	0.769	0.739	0.783
Panel I: 所属地区	东部			中西部		
<i>ctime</i>	0.098 (0.183)	0.268 (0.184)	0.183 (0.160)	0.354 *** (0.122)	0.135 (0.118)	0.244 ** (0.098)
样本量	623	623	623	1139	1139	1139
R ²	0.774	0.735	0.782	0.744	0.735	0.766

注：以上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特征、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最后，Panel G ~ I 分析了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影响。可以看出，对于居住在乡镇、郊县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父母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的负向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地区。由于这些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并且传统观念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父母对子女学习的日常监督和辅导显得更加重要，而父母通勤时间的增加可能导致对子女学习的关注减少。

五 实证结果：父母陪伴的机制分析

根据模型 (2) 和模型 (3)，本部分检验了父母陪伴在父母通勤时间影响子女学习成绩中的机制作用。表 7 首先分析了父母通勤时间对陪伴子女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和各项固定效应后，我们发现通勤时间增加对父母与子女谈论学校事情的频率 (*talksch*) 和要求子女完成作业的频率 (*finish_hw*)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对检查子女作业的频率 (*check_hw*) 和访员根据家庭环境观察到的父母关心子女教育的程度 (*care_edu*) 没有明显影响。本文对此的解释为：首先，相较而言，父母与子女谈论学校事情的频率更能体现出父母陪伴子女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通过日常交流能够

更加全面掌握子女的学习状态,并且能够从情感上给予子女帮助和支持(Lee & Bowen, 2006; 周皓, 2013; Blondal & Adalbjarnardottir, 2014);其次,虽然要求子女完成作业所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小,但是也能够体现出父母对子女学习的日常关注程度;再次,检查子女作业一方面源于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可能来自学校老师的要求,要求家长检查子女作业并签名确认在初等教育阶段屡见不鲜;最后,由于CFPS中访员根据家庭环境观察到的父母关心子女学习的程度主要是基于家庭物质条件,例如孩子的画报、图书或者其他学习资料的数量,因此该项指标更多地反映了子女教育的物质基础,不代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就不重视子女教育。

表 7 父母通勤时间与陪伴子女

	<i>talksch</i>		<i>finish_hw</i>		<i>check_hw</i>		<i>care_edu</i>	
	(1)	(2)	(3)	(4)	(5)	(6)	(7)	(8)
<i>ctime</i>	0.394 *** (0.134)	0.425 *** (0.138)	0.186 * (0.097)	0.185 ** (0.090)	-0.062 (0.158)	-0.041 (0.158)	-0.069 (0.130)	-0.076 (0.132)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94	1694	1513	1513	1493	1493	1454	1454
R ²	0.608	0.620	0.518	0.540	0.672	0.677	0.510	0.522

注: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分别表示10%、5%和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CFPS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 8 进一步分析了父母陪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其中,父母与子女谈论学校事情的频率、要求子女完成作业的频率以及检查子女作业的频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父母陪伴和重视教育对子女学习成绩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访员根据家庭环境观察到的父母关心子女教育的程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本文认为,基于上述对该指标的具体分析,家庭中学习资料的多少并不能完全体现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正如我们不能断言家庭收入较低的父母都不关心子女教育。另外,通过对比 4 项指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要求子女完成作业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最大,而与子女谈论学校事情对子女数学成绩的影响较大,检查子女作业对语文成绩的影响较大。

表 8 父母陪伴对子女成绩的影响

	<i>math</i>				<i>chinese</i>				<i>mscores</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talksch</i>	0.094 *** (0.026)				0.076 *** (0.027)				0.085 *** (0.024)			
<i>finish_hw</i>		0.119 *** (0.028)				0.105 *** (0.030)				0.112 *** (0.025)		
<i>check_hw</i>			0.071 ** (0.028)				0.098 *** (0.027)				0.085 *** (0.024)	
<i>care_edu</i>				0.043 (0.031)				0.016 (0.034)				0.029 (0.028)
样本量	1694	1513	1493	1454	1694	1513	1493	1454	1694	1513	1493	1454
R ²	0.749	0.751	0.743	0.758	0.728	0.724	0.740	0.724	0.767	0.768	0.766	0.767

注：以上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特征、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并在个体层面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综合来看，表 7 和表 8 的回归结果证明了父母陪伴是通勤时间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一种潜在机制。即随着父母通勤时间的增加，父母陪伴子女的频率会降低，从而导致子女学习成绩下降。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职住分离已经成为影响就业者工作 - 家庭时间分配的重要参考因素 (Black et al., 2014)，而现有文献关于这一现象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仍然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讨论。本文利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三次 CFPS 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和潜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就业者通勤时间增加会降低其子女的学习成绩，表现为父母平均的单程通勤时间每增加 15 分钟，会导致其子女的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分别下降 0.6 ~ 2.4 分和 0.4 ~ 1.6 分；其次，基于个体、家庭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女孩、中学生和没有参加课外辅导的子女学习成绩受父母通勤时间增加的负向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而父母从事受雇工作、具有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家中有祖辈老人，以及居住在城市、市辖区和东部地区的子女受到的影响较小；最后，本文证明通勤时间增加导致就业者日常陪伴子女的频率下降，是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一种潜在机制。

青少年学习与受教育质量不仅关乎未来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Schultz，1960）。因此，在人口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化共同作用导致就业者职住分离程度上升时，我们不应忽略由此带来的对就业者工作 - 家庭时间分配及其子女学习成长的负面影响。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着手改善：

首先，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交通网络，提高通勤便利性与职住平衡性。本文发现，通勤时间增加会挤出就业者对子女的陪伴，从而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公共部门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的建设和优化，另一方面在推行住房市场化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存在住房困难的弱势群体，可为其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事实上，许多城市政府已经意识到通勤行为在城市高效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职住平衡”纳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例如，《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 - 2020 年）》中提到吸纳中心城区人口及产业功能的扩散，将职住平衡作为建设卫星城镇和城镇群的衡量标准之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 2035 年）》首次将“职住平衡”作为政策目标提出，强调优化就业岗位分布，缩短通勤时间，创新职住对接机制，推进职住平衡发展。

其次，普及儿童学前教育和家庭育儿服务。在人口老龄化加重和“三孩”政策推出的双重背景下，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者在家庭子女照料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考虑到工作 - 家庭时间的合理分配，应进一步在全国层面，尤其是在乡镇、郊县和西部地区，普及儿童学前教育和家庭育儿服务，以弥补由于职住分离带来的父母陪伴缺失。

最后，积极探索适合儿童健康发展的课后辅导模式。教育部 2017 年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进一步明确，“要在 2021 年秋季学期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这两项政策的相继出台，一方面缓解了就业者平衡工作 - 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的良性积累。继续积极探索适合儿童健康发展的课后辅导模式，不仅是对职住分离下父母对子女教育关注不足的有效补充，而且对打破课外补习乱象，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柴彦威、张艳、刘志林 (2011),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学报》第 2 期, 第 157 - 166 页。
- 丁守海、时新哲 (2012), 《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第 10 期, 第 108 - 115 页。
- 董志强、赵俊 (2019), 《“留守”与儿童竞争偏好：一项实地实验研究》, 《经济学动态》第 4 期, 第 33 - 48 页。
- 符婷婷、张艳、柴彦威 (2018), 《大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天通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第 4 期, 第 547 - 555 页。
- 顾天竹、马建富、孙柔 (2021), 《子女教育投入：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 《教育学报》第 4 期, 第 148 - 165 页。
- 胡枫、李善同 (2009),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 5 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第 2 期, 第 67 - 74 页。
- 李春江、张艳、刘志林、柴彦威 (2021), 《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北京 26 个社区的调查研究》, 《地理科学》第 9 期, 第 1606 - 1614 页。
- 李贵卿、井润田、吴继红 (2010), 《工作 - 生活多角色责任感的测量及影响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第 4 期, 第 130 - 140 页。
- 李佳丽、何瑞珠 (2019),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 《中国青年研究》第 8 期, 第 97 - 105 页。
- 李庆海、孙瑞博、李锐 (2014),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模式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 10 期, 第 4 - 20 页。
- 李云森 (2013), 《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 (季刊)》第 3 期, 第 1027 - 1050 页。
- 梁海艳、孟斌、李灿松 (2014), 《大城市职住分离的区域测度方法探究——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学刊》第 4 期, 第 16 - 25 页。
- 梁文艳、叶晓梅、李涛 (2018), 《父母参与如何影响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基于 CEPS 基线数据的实证研究》, 《教育学报》第 1 期, 第 80 - 94 页。
- 孟斌 (2009),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地理学报》第 12 期, 第 1457 - 1466 页。

- 苗瑞凯、王俊秀 (2021),《通勤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美好生活的视角》,《心理科学》第3期,第713-719页。
- 聂金菊 (2005),《农村初中生厌学行为调查》,《中国教育学刊》第2期,第29-32页。
- 秦敏、朱晓 (2019),《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第3期,第38-51页。
- 任媛、赵晓萍、钟少颖 (2018),《大城市职住分离的理论阐释与平衡路径——基于文献的评论》,《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第53-58页。
- 孙斌栋、吴江洁、尹春、陈玉 (2019),《通勤时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城市发展研究》第3期,第59-64页。
- 唐有财、符平 (2011),《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第5期,第41-49页。
- 王春超、林俊杰 (2021),《父母陪伴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研究》第1期,第104-128页。
- 王晶、吴明霞、廖礼惠、吴梅宝 (2010),《国外工作-家庭平衡研究的现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8期,第1269-1276页。
- 吴愈晓、王鹏、杜思佳 (2018),《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98-120页。
- 吴重涵、张俊、王梅雾 (2017),《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教育研究》第1期,第85-94页。
- 熊瑞祥、李辉文 (2016),《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393-414页。
- 许琪 (2018),《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青年研究》第6期,第39-51页。
- 徐鑫铨、邓赐平、刘明 (2020),《父母学业参与和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父母心理控制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第6期,第1341-1347页。
- 詹鹏、毛逸波、李实 (2021),《城镇女性劳动供给长期趋势研究:来自教育扩张和生育行为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第56-74页。
- 张皓辰、秦雪征 (2019),《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财经研究》第2期,第46-58页。
- 周皓 (201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亲子交流与儿童发展》,《青年研究》

第 3 期，第 11 - 26 页。

- Amstad, Fabienne, Laurenz Meier, Ursula Fasel, Achim Elfering & Norbert Semmer (2011). A Meta-Analysi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Various Outcome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Cross-Domain Versus Matching-Domain Relation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6 (2), 151 - 169.
- Aryee, Samuel, Ekkirala Srinivas & Hwee Tan (2005). Rhythms of Lif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Work-Family Balance in Employed Paren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 (1), 132 - 146.
- Avvisati, Francesco, Marc Gurgand, Nina Guyon & Eric Maurin (2014). Getting Parents Involved: A Field Experiment in Deprived School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 (1), 57 - 83.
- Black, Dan, Natalia Kolesnikova & Lowell Taylor (2014). Why Do So Few Women Work in New York (and So Many in Minneapolis)?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across US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79, 59 - 71.
- Blondal, Kristjana & Sigrun Adalbjarnardottir (2014).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School Dropout through Student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 (4), 778 - 795.
- Del Bono, Emilia, Marco Francesconi, Yvonne Kelly & Amanda Sacker (2016). Early Maternal Time Investment and Early Child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126 (596), 96 - 135.
- Duncan, Beverly (1956). Factors in Work-Residence Separation: Wage and Salary Workers, Chicago, 195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1), 48 - 56.
- Ermisch, John & Marco Francesconi (2013).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mployment on Child Schooling.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8 (5), 796 - 822.
- Gonzalez-DeHass, Alyssa, Patricia Willems & Marie Holbein (2005).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 Motiv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7 (2), 99 - 123.
- Greenhaus, Jeffrey & Nicholas Beutell (1985).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 (1), 77 - 88.
- Grzywacz Joseph, Dawn Carlson, Michele Kacmar & Julie Wayne (2007).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Synergi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0 (4), 559 - 574.

- Gutiérrez-i-Puigarnau, Eva & Jos van Ommeren (2010). Labour Supply and Commuti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8 (1), 82 – 89.
- Gutiérrez-i-Puigarnau, Eva & Jos van Ommeren (2015). Commuting and Labour Supply Revisited. *Urban Studies*, 52 (14), 2551 – 2563.
- Hango, Darcy (2007). Parental Investment in Childhood and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Can Greater Parental Involvement Mediate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6 (4), 1371 – 1390.
- Lee, Jung-Sook & Natasha Bowen (2006). Parent Involvement,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Achievement Gap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3 (2), 193 – 218.
- Lu, Yao, Xinzheng Shi, Jagadeesh Sivadasan & Zhufeng Xu (2022). How Does Improvement in Commuting Affect Employe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orthcoming.
- Ross, Stephen & Yves Zenou (2008). Are Shirking and Leisure Substitutable? An Empirical Test of Efficiency Wages Based on Urban Economic Theory.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8 (5), 498 – 517.
- Ruderman, Marian, Patricia Ohlott, Kate Panzer & Sara King (2002). Benefits of Multiple Roles for Managerial Wome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2), 369 – 386.
- Ruhm, Christopher (2004). Parental Employment and Child Cognitiv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9 (1), 155 – 192.
- Sakanishi, Akiko (2020). Urban Commuting Behavior and Time Allocation among Women: Evidence from US Metropolitan Areas.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12 (2), 349 – 363.
- Sandow, Erika, Olle Westerlund & Urban Lindgren (2014). Is Your Commute Killing You? On the Mortality Risks of Long-Distance Commut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6 (6), 1496 – 1516.
- Schultz, Theodore (1960). Capital Formation by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6), 571 – 583.
- Sieber, Sam (1974). Toward a Theory of Role Accu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4), 567 – 578.
- van Ommeren, Jos & Eva Gutiérrez-i-Puigarnau (2011). Are Workers with a Long Commute

Less Produc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bsenteeism.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1 (1), 1 – 8.

White, Michelle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Urban Commuting Patter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2), 368 – 372.

Workplace-residence Separation, Parental Companionship,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Li Hanxiong, Sun Weizeng & Yang S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Using the CFPS data (2014 – 2018),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arents' commuting time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every 15 minute increase in parents' average commuting time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in children's math score by 0.6 to 2.4 points and a decrease in Chinese literacy score by 0.4 to 1.6 points, and the influence from mother is greater. Second, the effect of commuting time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ha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ies across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regions; girl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dolescents whose parents are self-employed or poorly educated, and those living in towns, suburban areas or western regions are affected more heavily; but having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grandparents' supervision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Third, the reason behind is that parental attention and supervision on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homework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commu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couraging fertility and implement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in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layout planning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promo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youth human capital.

Keywords: workplace-residence separation, commuting time, parental companionship, academic performance

JEL Classification: R41, J13, J24, I21

(责任编辑：合羽)